

继承与创新：研读斯图亚特·霍尔 代表作《编码/解码》

陈力丹 林羽丰

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出斯图亚特·霍尔的经典之作《编码/解码》四个部分的逻辑线索，并为文章绘制了一个文理上的金字塔。在这个金字塔中，结构主义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它的两个支点。然而，在文化主义的传统下，霍尔分别对这两股思想做了修正，扬弃了符号学的文本中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消费直接同一性。这种修正是颠覆性的，最终形成了这篇文献与以往传—受观断然诀别的理论气质和强烈的批判色彩。继承与创新并存，这正是霍尔模式的最大特点。而以往学者多将这篇文献仅仅当作一份受众调查指南，忽视了其中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真正倡导的研究取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符号学 符码 文化研究 受众研究

一、引言

2014年2月10日，英国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溘然长逝，享年82岁。《卫报》即时发布了他的学生大卫·莫利（David Morley）的悼文，文中莫利这样评价道：“当年文化研究还只是少部分人的事业，半个世纪后它便无处不在、硕果累累了。”^[1]文化研究不是霍尔的全部，但“霍尔的名字就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2]。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时期的文化研究并不是毫无建树的，但直到霍尔，它才获得了稳定的视域和自给自足的研究范式。正是霍尔思想的深刻与复杂，带动了20世纪60-70年代文化传播学派研究的快速发展。霍尔的思想直接受益于符号学，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使他注意到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的嵌入，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使他对“差异”高度敏感，^[3]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领导权”则使他看到文化背后无形力量的角逐。霍尔也是西方新左翼思潮的旗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深刻的透析。“尽管他对他的马克思主义‘不作保证’，但那始终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4]用符号学解构微观现象，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宏观机制，将这两股思辨要求较高的思路融于一身，这是霍尔思想的深刻所在。对思想继承“不作保证”，对符号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其

他更多思想都有取舍、创新，这又是霍尔思想的复杂所在。

《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 1980)作为霍尔的代表之作，集中体现了其继承与创新并存的思想特征。然而今天，这篇文献连同霍尔却往往被我们所读“薄”：有人投入全部注意力以三种立场的思想考古来勾勒霍尔的思路；^[5]有人则把文中对符号学的调用描述为工具性的导入，对霍尔的剖析不加任何马克思主义的讨论；^[6]有人认识到霍尔“开启了建立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概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新纪元”，看到了思想的承递而忽视了其中的偏离。^[7]

本次对《编码/解码》的研读发现，结构主义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电视传播内容和电视生产过程两个层面上，启发了霍尔对电视生产的理解，这是这篇文章所包含的两个传统。但在“文化主义”(Culturalism)^[8]的框架下，霍尔完成了两次理论“叛离”——对文本中心主义的、对生产消费直接同一性的——基于他对理论继承“不作保证”的开明认识。这两次“叛离”才真正形成了这篇文献与以往传-受观断然诀别的理论气质和强烈的批判色彩。而今天我们的“薄”读，倾向于将这篇文献仅仅当作一份受众调查指南，身处意义丰富的田野却只是为收受实践做做札记，复归与霍尔精神相悖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

二、《编码/解码》的文理

《编码/解码》的前身是霍尔1973年在莱斯特大学所做的一场学术报告，该学术报告不久后以《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为题，发表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内部刊物上。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非公开流通之后，这篇文章才被纳入《文化·媒介·语言》(Culture, Media, Language, 1980)的论文集中得以公开发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莫利“《举国上下》研究”的带头推广下，“随着受众研究的复兴，《编码/解码》几乎被奉为这一领域的经典文本”。^[9]

国内对这篇经典文献的解读，从教育学、文学到传播学都有尝试且进路各异。由于霍尔的文章表述佶屈聱牙，有研究者通过拣取、复述文中的经典修辞来拼接文献全貌；^[10]有研究者从文本间性出发，对关键概念进行考古；^[11]还有研究者通过比对媒介现实来理解文章。^[12]

而本文则把《编码/解码》视作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主张从文献本身摸索因果链条和效力传递。这样的研读试图还原霍尔头脑中的“编码解码”理论本身，学术意义不亚于前述的研究进路。根据这种思路，本文被分为四个部分：

(一) 结构化的传-受主体及其活动/重写受众研究的正当性

《编码/解码》一开始(1-7自然段)就指出，对电视生产过程的分析可以参照马克思的思路，将其视作“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的“接合”(articulation)，结构化地考察传-受活动。文章接着提出，身处不同社会结构中的传

者和受众是不对称的，相应的编码、解码不是同一的，这种差异要求我们摆脱传统传播理论用编码解释解码、从技术到哲学的思路，有区别地讨论传播和收受。（见图1）正是由于把电视生产的一切都与结构相联系，霍尔发现了解码与编码相较确实存在的差异以及差异形成的机制，推翻了以多元主义解释传播结果、崇拜传者轻视受众、回避体制性因素的传统认识，确立了严肃研究受众的取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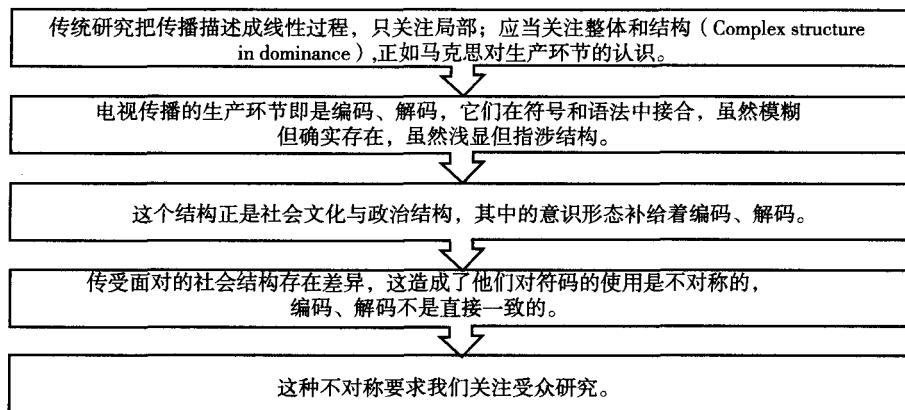


图1 《编码/解码》第1-7自然段的思路

（二）建构的电视符号/一个符号学的讨论

在文章的第8-16自然段中，霍尔首先指出了电视符码指代“任意”的建构本质；接着参考巴特的神话理论提出，电视符码的二度所指混入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再借助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发现，不同所指之间是不平等的，存在着一个得到整体意识形态支持的主导型话语。（见图2）这里，霍尔从讨论电视生产整体转入分析电视传播内容，熔炼了结构主义符号学和意识形态理论，给电视传播内容标注了鲜明的意识形态标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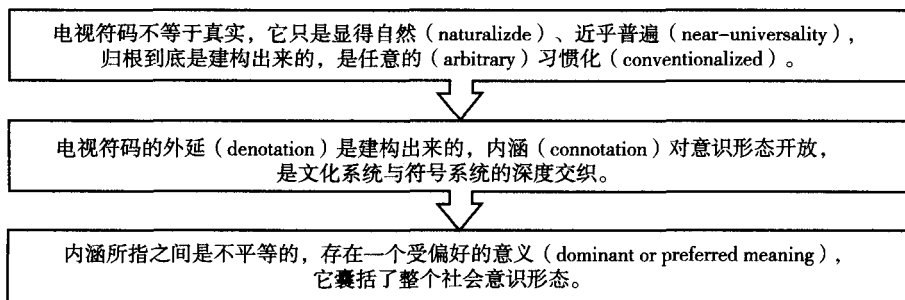


图2 《编码/解码》第8-16自然段的思路

（三）传播：结构化的主体面对结构化的符码

在第17-19自然段中（见图3），霍尔合流了前两部分的讨论：结构化的电视生产过程和建构性的电视传播内容组成了一个卷入诸多要素、环环相扣、内部充满角力的电视生产系统；传统传播研究所讨论的“有效传播”是编码、解码、符码各个环节精确接合的结果之一，这意味着，“误读”也是一种系统性的结果而非意外。到这里，霍尔完成了对编码解码的重写，他从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两条路径出发，从哲学到技术，重新勾勒了一个牵涉阶级、权力的文化生产系统，这个系统是当时的主流传播学界所陌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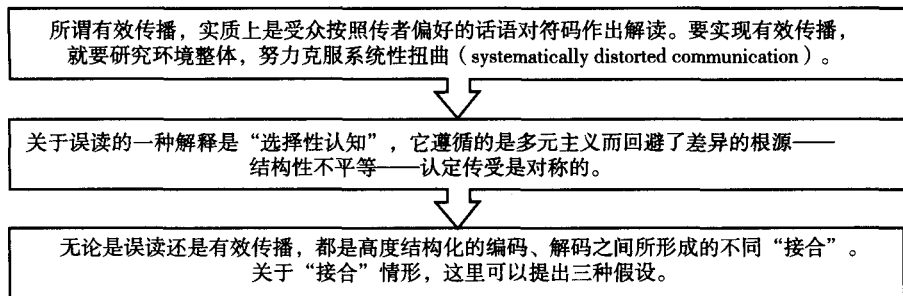


图3 《编码/解码》第17-19自然段的思路

（四）三种假设的“接合”

编码解码的“霍尔式”重写一经完成，假想传-受接合的具体形式就是水到渠成。从第19自然段到最后，霍尔提出了经典的三种解码立场（主导-霸权式、协商式、抗争式），这一部分的篇幅较全文并不占多数，思想上也不再有飞跃。有研究将霍尔的解码立场分类追溯到了帕尔金（Frank Parkin）的《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1971），后者提出社会价值系统的三种类型（主导型、屈从型、激进型）。^[13]从中可以看出，霍尔对三种解码立场的假想并不是这次思想结晶的高潮，更像是借由阅读经验顺势发散的联想。而在思想气质上，这部分也不再像前文那样诉诸思辨，反而有为实证研究开道的取向。

（五）《编码/解码》的两个传统

《编码/解码》从结构主义符号学出发，强调电视符码是一种有别于真实世界的营造出来的表意系统，里面包含着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优势的主导意识形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指出电视生产牵连着一整套社会文化，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不是简单的应激反应，而是社会总体介于主体的意识形态输出。霍尔借助这两个传统试图书写一套与美国传播学完全不同、全面结构化、非个人非偶然的传播模式论。

到这里，有必要重新串联一遍这篇文章。这一次我们从文章的结论回到假设再

到理论，为霍尔的演绎画出一个金字塔（见图4）。在这个金字塔中，三种解码立场由传播过程的结构性接合直接托举起来，而结构性接合这一点源自对电视话语的符号学解构和电视话语生产结构化的发现，这两条线索分别得到了结构主义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支持。三种解码立场位于金字塔顶端，是本次理论建设的收官，但它的有无并不影响整体架构的稳定；相比之下，结构主义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这篇文章的根基，支撑着“霍尔式”编码解码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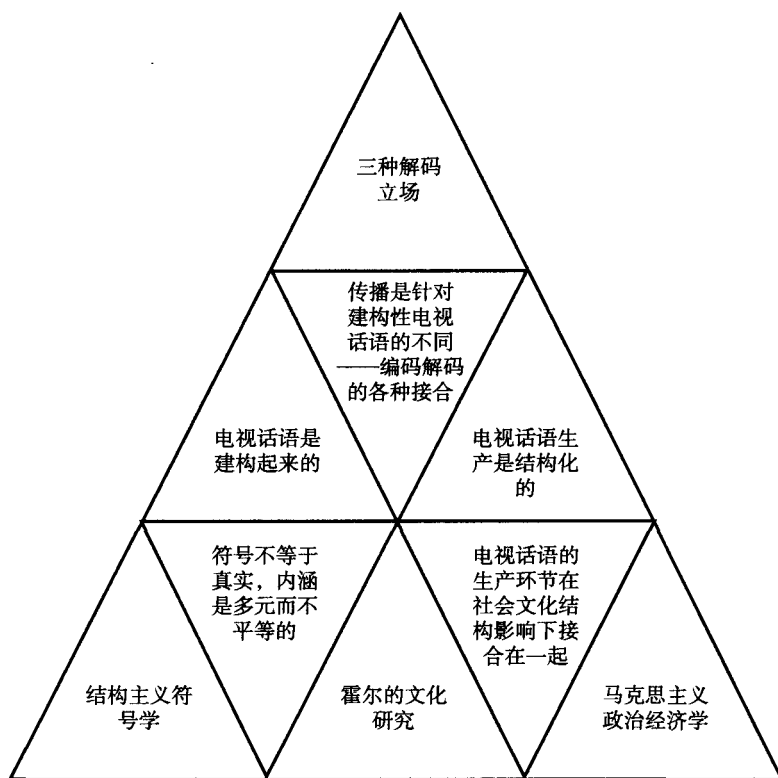


图4 《编码/解码》的金字塔体系

三、“霍尔式”的理论继承

《编码/解码》中的符号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清晰明确，这一点也可以在霍尔生平思想研究中得到印证。^[14]但继承并不是这篇文章的全部：作为支柱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文推进过程中都接受了霍尔的调整。这种调整是革命性的，针对的是既定的认识论——对符号学的调整基于文化研究关注大众的取向，是从文本中心主义转向受众中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调整则是从生产消费直接同一转向编码解码非直接同一，暗含了对经济还原论的扬弃。

（一）从文本中心主义到受众中心主义

在《编码/解码》的演绎中，符号学扮演着重要角色，其重要程度可能超过我们从文本中直观感受到的。比如有人发现，删减前的原稿起初还有大段对西部类型片的符号学分析。^[15]

1. 符号学传统

霍尔对电视话语的解读，包括对视觉符号虚构性的阐释和对内涵多元所指的发现，这些都来自符号学理论的积淀，包括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的符号唤起知觉条件、罗兰·巴特的二度符号化、诺夫·沃洛希诺夫（В. Н. Волошинов）的泛意识形态。在电视方兴未艾、大众无不沉浸在其巨大魅力的当年，艾柯率先认识到了符号是对现实的反映也是抽离，电视符号的类真实特点只是因为它具备了真实的局部特征；而巴特“神话”理论中颇具开创性的二度所指体系，在这里则被霍尔平移到电视话语的分析中来；还有巴特和沃洛希诺夫对意识形态的警觉和还原。这些观点作为《编码/解码》为数不多的引据，支撑起文章鲜明的符号学传统。

2. 从强调文本到强调读者：一次文化主义的修正

符号学把重心放在文本上，而霍尔却用以烘托受众。文本中心主义是符号学研究的一个预设立场，虽不意味着研究者完全忽视读者的能力和感受，但确实要求更高程度地聚焦文本和前后文。正是因为把文本或者符号视为意义的主要载体、作为研究对象，符号学才获得了审视日常生活的独一无二的视角——文本中心主义几乎就是符号学的基因。德里达所言“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则把这个主张推到了极致。而文本中心主义又是精英主义的。在符号学家看来，符号化是多数人发出的行为，但面对文本他们又是没有抵抗力的，解读符号必须交给研究者来完成，由符号学研究符号中丰富的意指和不为察觉的机制。

但是，霍尔和他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从传统上排斥这套精英主义的认识。在文化研究形成之初，雷蒙德·威廉斯的一项奠基工作即是把“文化”从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定义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与言论”中解放出来，“使得艺术文化从一小群有特权的人所进行的创作活动扩大到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使得一系列广泛的文化实践具有了被研究、被探讨的合法性”^[16]。把“生活的总体方式”（whole way of life）作为研究对象，对大众文化持平视态度，这成为了后继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观念。

这种理念在引入结构主义符号学后出现了松动，文化研究趋向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文本分析上，钻研文本而淡忘民众，陷入了为符号学作注脚的危机之中。在这个时候霍尔讨论编码和解码，用意之一即是重新提出民众的角色。虽然霍尔仍然征用经典符号学理论来分析电视传播内容，但这些讨论首先承认结构化的受众解码机制。也就是说，电视文本的意识形态功能受制于受众因素，编码者和文本虽然采取了不同的符号化策略但也难以保证成功，必须面对不同受众有组织地接受、协商

甚至抗争。在这套论述中，符号的力量被限制在内容之中，它要面对独立、严肃的受众解码。而既然受众不会百分之百被文本说服，文本就不能被当作文化本身来研究，受众的判断和参与应当被承认和考虑。

这种处理消退了符号学对文化研究的侵蚀，转而使其成为了文化研究在特定领域的分析工具，打捞了文化主义的传统。霍尔的《编码/解码》也因此成为文化研究跳脱符号学、实现中兴的关键，而非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结构主义抬头的推手。^[17]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调整，出于文化研究的受众本位思想，是一次基于文化主义传统的习惯性纠正。

（二）从生产消费的直接同一到编码解码的非直接同一

《编码/解码》的目的，是要书写出一套论及机制的受众研究主张，这与美国传播学出于平衡而提及的受众研究^[18]有着根本区别。为此，仅仅解决文本中心主义的问题是不够的，霍尔需要在宏观层面确立一套解释。于是，霍尔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来说，是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的划分和辩证分析。

这篇文章提及马克思生产过程观的地方有三处：第一处是在文章伊始，霍尔批判线性传播观不重整体，提出了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1857）和《资本论》（*Das Kapital*）中论及的“生产—分配—再生产”的生产总过程为借鉴，用以理解电视生产的结构性，为发现编码、解码的差异做了铺垫。^[19]第二处是在对电视传播的结构性生产做小结时，将其比作话语中的“劳动过程”。^[20]第三处讨论的是受众解码之后的结构性反馈重新进入编码环节，构成了一个电视生产的大“流通”。^[21]

从篇幅上看，文章对马克思观点的引用不过是提及了《资本论》和几个特定表述，寥寥几字也只能算作“提及”，谈不上“阐述”。从内容上看，霍尔并没有对马克思的观点做更多解说，他将很大一部分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悬置在文本之外，客观上造成了这篇文献在文字格局与思想框架上的不对称。这个有意无意的留白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继的文献解读过分倒向对符号化的讨论，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部分的考察。

1. 马克思关于生产消费的论说

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的论述，最早集中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部分。整个大纲也被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一份尚未完成的草稿，1902年被发现，随后被补录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在《编码/解码》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比较阅读中可以清晰地发现，前者从马克思关于生产、消费的辩证思考中，认识到了生产结构化的问题。这构成了编码解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间紧密的互文关系，形成了《编码/解码》的另一个重要思路。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的第二小节“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中，马克思首先申明了他对生产环节的强调不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重视分配

的简单纠正，不是辩证法的把戏，而是对现实关系的描述。传统政治经济学认识到了生产本身也是一种消费，包括对生产主体能力的消耗和对生产资料的消耗。马克思则补充道，劳动者通过吃喝生产自己的身体，通过消灭生产的产品实现产品的人化，在这种情况下，消费也是一种生产。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这种关系被马克思概括为“直接的同一性”（immediate identity）：“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同时，生产中中介着消费——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对消费做出内容、性质、方式上的规定，通过产品引起消费的需要；而消费也中介着生产——赋予生产意义，引起新的生产需求。最终，“每一方都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23]生产与消费交织共生汇入生产的全过程。

2. 从直接同一到非直接同一：一次协商的继承

从文化研究的观照出发，霍尔发展出了编码与解码的辩证关系。在电视符码的传播总过程中，专业人员从现实生活中采集画面、结合意义进行符号化操作的活动即是电视生产，也就是编码，受众在电视上看到画面、做出解读的活动即是电视消费，也就是解码。马克思发现的生产、消费关系，同样适用于描述编码与解码的关系：编码直接是解码，专业人员的画面采集和加工工作是一种基于专业视角对周遭视觉符号习惯的解构和学习，编码的产品直接刺激解码的需要；解码直接是编码，受众解读文本的过程有很大一部分是对编码图式的推测，解读的结果则成为下一次编码工作的潜在教案，通过影响编码结构参与电视传播过程的再生产环节。

但在概括编码、解码的关系时，霍尔与马克思拉开了距离——霍尔称：“编码、解码不构成直接的同一性。”^[24]这里霍尔采用了一种微妙的部分否定式陈述，包含了他对二者关系的两重认识：一方面，霍尔认同编码、解码作为生产、消费在电视传播中的具体表现具有生产、消费所普遍具有的辩证关系，二者间有明确的关联，这一点可以从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图中看出——虽然霍尔不断强调编码、解码是不对称的，但导图中的编码结构与解码结构都是由知识架构、生产关系和技术基础组成，要素上存在着——对应的关系。而另一方面，霍尔又强调编码、解码的“差异”，这种差异即是编码、解码在构成单元一致的条件下包含不同的内容，而这种内容不是个人的、不可预计的，而是编码者和解码者在不同社会文化结构下的不同养成。这样一个否定的肯定，反映了霍尔对马克思关于生产环节辩证关系的继承，以及在结构主义指导下对“差异”的坚持。

正如斯宾诺莎所言“规定就是否定”，马克思强调生产环节的同一，是为了打破传统政治经济学中单纯研究分配关系、悬置生产的偏见，他对生产、消费同一性的界定并不排斥生产、消费的鲜明区别，而是不赞同庸俗经济学割裂生产和消费。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使命。

而霍尔强调传播环节的差异，是为了反对传播中心主义，强调区别研究编码、解码的必要性，他对编码、解码同一性做出否定并不影响他认同二者的密切联系，

他要批判的是，传统传播学在编码、解码对称性的问题上陷入神话，不假思索地将解码看作编码的逆向重复。这是传播学的使命。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导言》第二节的最后，亦对“同一性”下的“差异”做了补充：“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25]

总之，在提出编码、解码不直接同一的过程中，霍尔考虑到了传播学科自身要解决的问题。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的修正不是批判性的，实际上恰恰接受了马克思关于生产消费辩证关系的论断，只是在运用中加入了结构主义的考虑。

3.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霍尔

然而，这样一处看似细微的调整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却是颠覆性的，它未必能被马克思所接受。

生产与消费的同一体性包含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决定消费的基本认识，这里其实没有给消费环节保持结构性差异留有余地，生产与消费是不存在“非直接同一”的。因此，霍尔的修正实际上挑战了马克思为生产、消费设定的紧密的主从关系，在消费的决定因素中加入了社会文化系统的变量，把马克思划作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摆在了与生产、与经济基础同等重要甚至优先影响的地位。

在《编码/解码》的第一段，霍尔曾使用“一个连续往复的循环”（a continuous circuit）的概念^[26]来形容从生产到消费到再生产的电视生产全过程，这与编码、解码非直接同一的思路是一致的。在营建传-受模式的过程中，只有构成循环，受众才有机会前置传播者，才能被赋予参与生产、共创意义的权力。而这实质上违背了马克思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只是反作用于生产的基本观点。再有，霍尔主张电视生产的各个环节是“接合”在一起的，环节之间维系着一种松散的联系，前者的完成并不能保证后者的实现。“接合”贯穿于霍尔对文化、意识形态、撒切尔主义的认识中，同样包含了对马克思观点的修正：它打散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必然联系，“几乎是颠覆了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力量决定上层结构的关系”。^[27]显然，霍尔不主张经济还原论，而这也是文化研究学派与政治经济学派的分歧。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霍尔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它支撑了文章两条理论线索中的一条。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忽视生产、回避结构的批判，启发了霍尔对早期传播学传-受观念的反思，以及从结构入手考察传播全过程的中观视野。而生产、消费直接同一的观点，启发了霍尔从同一和差异两方面审视编码和解码，使其既看到了电视生产的结构交织，又看到了传播结果的建构性。

正是马克思主义浇注了这篇文章与众不同的意识形态批判色彩。《编码/解码》试图说明：电视话语的传播是一种生产结构套装结构符码的高度符号化的人类活动，身处不同社会结构的编码者、解码者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利益诉求融入到传播和接

收过程中，以参与并影响电视话语的生产一般，促进自身利益的实现。电视话语生产过程，交替上演着集权和移权的戏码，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无形斗争。

四、霍尔模式的内涵

（一）不作保证

在许多研究者的眼中，霍尔令人称道的一点就是他在理论运用上的洒脱和开明。“不作保证”，成为了人们理解霍尔思想的重要线索。这一点在《编码/解码》一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文章通过结构主义符号学剖析电视传播内容的建构性，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辨析编码和解码的关系，源于符号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但又做出了适应文化研究的调整，扬弃了文本中心主义和生产消费的直接同一性，最终得出了充满文化主义关怀的受众研究主张。这种理论飞跃得益于研究者本人的学术锐意。霍尔模式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他并不把自己禁锢在某一学科里，拒绝把自己的理论局限在某种学术传统或归类于某一学术派别，最为不安分的是霍尔那探寻自然、真实的心智。”^[28]

（二）马克思主义与传播中的意识形态再发现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阐述了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分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马克思把生产提到首位……政治经济学应当主要研究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29]这与霍尔当年所面对的学科形势何其相似：传统传播研究把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传播策略的研究上，一味探讨如何传递信息、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而回避了传播前的编码和作为再生产的解码、它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和整体社会结构。为什么回避？马克思也有讨论：

传统经济学家认为生产不同于分配，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乘机被当做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在分配上，他们则相反地认为，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方式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再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30]

这段论述在《编码/解码》中转化为了霍尔对“选择性认知”和多元主义的批判。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可以发现，早期传播学研究难以对现代化发展生成怀疑，它下意识地认定传递与接受本身是有益的，至少客观上掩藏了大众传播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阶级和结构差异混淆在多元主义的诠释框架中。这从一个角度解释了早期传播学研究很少涉及贫富、罢工、少数族群、亚文化等问题原因。直到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陆续意识到现代性（modernity）的问题和多元主义现代化（multiple modernization）的可能，传播学才由外而内开始转向。^[31]有的学者因亲睹资本主义危机而对现代化本身产生了怀疑，有的因在异域推广理论受挫而陷

入反思，有的则从经典文献中读来了对既有体制的批判和全新的认知方式。霍尔的《编码/解码》即属于第三种情形——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使霍尔意识到了传统的传播过程理论有着不可克服的短视和局限，进而转向对电视生产总体结构的研究和对传-受环节意识形态的再发现。

（三）《编码/解码》的真实意图

我们领会到霍尔关于受众研究的真正指向了吗？这篇文献究竟在谈什么？后进的受众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的研究仅仅是对三种解码立场的经验主义的证实或证伪。反观霍尔的精神，这些都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继承，即便是大卫·莫利。正是霍尔曾对莫利的研究有过这样一番评论：“莫利的研究并未完全采纳‘编码/解码’模型……我创立该模型的目的，也不是用它来指导长期的经验主义研究……关于大卫·莫利，我倒是有个疑问：你小子到底是怎样在真实存在的人身上检验理论的？”^[32]霍尔与莫利以及莫利开启的民族志研究之间存在断裂，这也是为什么有研究会切割师徒二人的学统而对他们各自的理论贡献进行区分。^[33]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编码解码的理论是被低估和压缩的。更多的后续研究沿用了莫利的范式，热衷于按照三种解码立场对调查得来的受众数据做拣芝麻一般的简单归类，完成对解码立场说的又一次复述，或对解码立场的类型做没有实质影响的增补。其实，霍尔提出三种解码立场，只是理论大功告成后的适当联想，而更为核心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分析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讨论、电视话语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电视生产过程的结构性冲突，却没有获得后人更多的智力投入。源于思辨的编码解码理论，被扭曲用作指导经验主义的受众调查，复归到它所批判的关注局部和迷信发展的偏见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霍尔理论的滥用和误用。正如有的学者所感叹的：“对释码的重视与对编码的忽视割裂了受众从电视节目生成意义的过程和电视节目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一个完整的理论模型变得支离破碎。”^[34]

当然，产生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编码/解码》并非永恒的经典（永恒真理也是霍尔本人所坚决反对的），而是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比如莫利在日后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三种解码模式并不能涵盖所有接收情形，比如主导型解读的动机和发生机制究竟是什么，以及更重要的，告别了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它还能支撑对电视生产的马克思式的批判吗？就像罗斯伯格（L. Grossberg）所忠告的：文化研究越来越远离经济，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35]

不过作为一篇传播学的经典文献，《编码/解码》仍然能够启迪我们去认识传-受关系、理解传播结果，从它的形成中体会学术结晶的要义。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注释

- [1] “Cultural studies was then a minority pursuit; half a century on it is everywhere, generating a wealth of significant work...” refer to The Guardian, “Stuart Hall Obituary,” February 10,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4/feb/10/stuart-hall>, April 18, 2014.
- [2] Helen Davis, *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 Sage, 2004. 转引自观察者：《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去世享年 82 岁》，2014 年 2 月 11 日，http://culture.ifeng.com/redian/detail_2014_02/11/33685544_0.shtml, 2014 年 4 月 18 日。
- [3] 金惠敏：《听霍尔说英国文化研究——斯图亚特·霍尔访谈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5 期，第 43 页。
- [4] “If his Marxism came ‘without guarantees’, it was nonetheless a vital part of him to the end.” refer to The Guardian, “Stuart Hall Obituary,” February 10,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4/feb/10/stuart-hall>, April 18, 2014.
- [5] 黄顺铭：《一个诠释典范：霍尔模式》，《新闻大学》2002 年第 12 期，第 15 - 19、9 页。
- [6] 蔡骥、谢莹：《文化研究视野中的传媒研究》，《国际新闻界》2004 年第 3 期，第 43 - 49 页。
- [7] 邹赞：《斯图亚特·霍尔论大众文化与传媒》，《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 12 月第 5 期，第 84 - 87 页。
- [8] 在界定“文化主义”的过程中，不同研究间存在差异：有研究在学科框架内着重考察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E. P. Thompson）在著述中体现的“文化”趣味；有研究上溯到英国文学传统，勾勒出一条从文学到文化的阿诺德 - 艾略特 - 利维斯 - 威廉斯的思想轨迹。这些研究中可以提炼出的一个普遍共识是，作为文化研究核心的“文化主义”，是一套反对功利主义、主张民主地看待大众文化、投身于考察日常生活传统的文化观。在霍尔看来，文化主义“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思考方式是对立”，它“的活力几乎全部源自结构主义观点”。参见：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64 页；陆扬《“文化主义”述评》，《三峡大学学报》2005 年第 5 期，第 5 - 11 页；萧俊明：《英国文化主义传统探源》，《国外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 期，第 55 - 62 页；邹赞：《英国文化主义研究述论》，《社会科学家》2011 年第 10 期，第 34 - 37 页。
- [9] 国内对《编码/解码》的翻译主要有两次，一次是罗钢、刘向愚主编、王广州直接翻译此文的《文化研究读本》（2000 年），一次是张国良主编、朱晨翻译的《20 世纪经典传播学文献》（2002 年）。
- [10] 胡春光：《学校生活中的规训与抗拒》，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7 年，第 80 - 83 页。
- [11] 章辉：《电视话语与阶级斗争：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的文本主题》，《学习与探索》2012 年第 4 期，第 123 - 128 页。
- [12] 黄鑫：《新的博弈——再读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新闻传播》2013 年第 4 期，第 143 - 145 页。
- [13] [美] 迈克尔·古列维奇、[英] 派迪·斯坎内尔：《赢得经典？斯图亚特·霍尔的

- 《编码/解码》》，〔美〕伊莱休·卡茨等编：《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1页。
- [14] 参见：〔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文化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化研究》，雷保蕊、张春美译，《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80-85页；马驰：《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6页。
- [15] 〔美〕迈克尔·古列维奇、〔英〕派迪·斯坎内尔：《赢得经典？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美〕伊莱休·卡茨等编：《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8页。
- [16] 曹书乐：《论英国传播研究——一种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9年，第53页。
- [17] 曹书乐：《论英国传播研究——一种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9年，第57页。
- [18] 在香农（C. E. Shannon）发表《传播的数学原理》之后，20世纪60年代，美国传播学界已经出现关于编码解码的讨论，有学者也据此初步提出了受众研究的主张甚至方法。参见：David K. Berlo,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 [19] “This second approach, homologous to that which forms the skeleton of commodity production offered in Marx’s *Grundrisse* and in *Capital*, has the added advantage of bringing out more sharply how a continuous circuit—production-distribution-production—can be sustained through a ‘passage of forms’.” 参见 Stuart Hall, “Encoding/decoding,” in Stuart Hall et al.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80, p. 117.
- [20]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of broadcasting, with their practices and networks of production, their organized relations and technical infrastructures, are required to produce a program. Using the analogy of *Capital*, this is the ‘labor process’ in the discursive mode. Production, here, constructs the message.” 参见 Stuart Hall, “Encoding/decoding,” in Stuart Hall et al.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80, p. 118.
- [21] “Thus—to borrow Marx’s terms—circulation and reception are, indeed, ‘moments’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television and are reincorporated, via a number of skewed and structured ‘feedbacks’, into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tself.” 参见 Stuart Hall, “Encoding/decoding,” in Stuart Hall et al.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80, p. 119.
- [22] 这部分手稿于1902年在马克思的遗稿中被发现，于1903年第一次发表在柏林《新时代》杂志上，1939年以德文在莫斯科出版，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我国从1962年开始陆续出版了这部手稿，尔后将其收入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6卷上、下册和中文第2版第30、31卷。参见：胡世桢：

- 《〈资本论〉研读》（上卷），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32页。
-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17页；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2002, "Production, Consump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Circulation)," in *Outline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Grundrisse)*,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7/grundrisse/ch01.htm#2>, May 17, 2014.
- [24] "They do not constitute an 'immediate identity'. The codes of encoding and decoding may not be perfectly symmetrical." 参见 Stuart Hall, "Encoding/decoding," in Stuart Hall et al.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80, p. 119.
-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 [26] Stuart Hall, "Encoding/decoding," in Stuart Hall et al.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80, p. 117.
- [27] 曹书乐：《论英国传播研究——一种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9年，第60页。
- [28] 武桂杰：《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语言大学，2007年，第5页。
-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 [31] 关于发展传播学的研讨，多追溯到勒纳（Daniel 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1958），讨论的主体是施拉姆（W. Schramm）的大众媒体与国家发展关系研究和罗杰斯（E. M. Rogers）的农村农业创新扩散研究，其核心主张是通过信息传播推动落后文明的现代化。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使得人们开始质疑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而发展传播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受挫直接促使以拉美传播学家为代表，甚至包括罗杰斯在内的一批传播学者加入到反思现代化和讨论范式转型的思考中。参见胡翼青、柴菊：《发展传播学批判：传播学本土化的再思考》，《当代传播》2013年第1期，第12-15页；李萌：《技术迷思与发展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2期，第69-76页；韩鸿：《论发展传播学近30余年的学术流变与理论转型》，《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4期。
- [32] [美] 迈克尔·古列维奇、[英] 派迪·斯坎内尔：《赢得经典？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美] 伊莱休·卡茨等编：《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7页。
- [33] 熊慧：《范式之争：西方受众研究“民族志转向”的动因、路径与挑战》，《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3期，第74-81页。
- [34] [美] 迈克尔·古列维奇、[英] 派迪·斯坎内尔：《赢得经典？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美] 伊莱休·卡茨等编：《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4页。
- [35] 邹赞：《斯图亚特·霍尔论大众文化与传媒》，《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12月第5期，第84-87页。

even strengthening the pattern of the original differential mode of powers.

93 The Diversity of Signifier Assists Ideological Communication

• *Sui Yan, Jiang Nan*

The diversity of signifier does not merely exist in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and logical inferences which are tedious and monotonou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ies can be experienced in the production, redesigning and borrowing of signifier through specific cases. The signifier constructe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on different layers infiltrates the ideology hidden behind it unconsciously, therefore becoming a metaphor for the new phenomena and problems in today's social culture.

99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Reviewing Stuart Hall's Encoding/Decoding

• *Chen Lidan, Lin & Yufeng*

Rereading Stuart Hall's Encoding/Decoding, this research divides the article into four parts and generalizes each part's logic. A pyramid of its literal structure is also proposed, which consists of structuralism semiotics and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However, the two ideologies support this article with determined revising by Hall, who abandoned the text centrality of semiotics and the immediate identity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Marxism. The revising is disruptive, shaping a resolute farewell and a serious critic on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communicator-audience. It is Hall's paradigm to apply theories and ideologies in the way of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But today we tend to think of this article only as a guidebook for audience survey, ignoring the intense reflection and the truly advocated approach of the encoding/decoding theory.

113 The Evolution and Meaning of The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Context

• *Liu hailong*

120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The Concept of The Critical School and Its Transitions

• *Hu Yiqing, Chen Ruge*

英文编辑 段铁铮